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

汪朝光

内容提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上上下下、各界各方,无论地域,无论阶级和阶层,无论党派及其政治立场,都深切体认到,这一次中国再无退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全国抗战因此而爆发。从此以后,全国抗日热情高涨,民气民意昂扬奋发,过往分散的、地方的、少数的局部抗战,迈向集体的、国家的、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成为中华民族在艰难重压下追求民族独立复兴之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标志之一。

关键词 卢沟桥事变 一致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17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警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同时郑重宣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对日抗战。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暴自卫声明》,严正宣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②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事态的急速演进和发展,使中国上上下下、各界各方,无论地域,无论阶级和阶层,无论党派及其政治立场,都深切体认到,这一次中国再无退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从而由过往分散的、地方的、少数的局部抗战,迈向如今集体的、国家的、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之路。本文即讨论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全国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过程,以就教于学界同仁。^③

一、地方当局拥护中央政府抗日

中国俗语有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语形象地表现出传统中国分合、治乱循环往复的历史

①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月至12月),台北,“国史馆”1987年版,第147页。

②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月至12月),第300页。

③ 有关本主题的研究,各种通论性著述中均有涉及,请参阅相关论著。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捐弃前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携手抗日,这也是全国一致抗日局面形成的重要方面,只是因为论文篇幅的原因,本文不讨论这方面的情况,留待另文讨论。

演进模式。中国既有中央政权高度统一治理的历史传统和心理积淀,也有中央政权衰弱时期的地方强权兴起及其各自为政。经历了元明清三朝连续 600 多年的统一历程,在内外环境的共同挤压作用下,近代中国似乎又一次出现了由合而分的发展趋势。清末地方督抚势力的逐渐兴起,表现出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倾向,随之又在由帝制中国向共和民国的转型过程中,因为武人势力的坐大,军阀割据一方,刺激了地方离心倾向的进一步成长。及至国民党以党军武力推倒北洋武人统治,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号召之下,复又开始由分而合的艰难历程。不过,1927 年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虽然名义上是个统一国家,然在实际上,地方实力派仍然各据一方,各说各话,自行其是,南京政府的许多施政措施无法推广施行。1931 年东北沦陷、1932 年上海战事、1933 年长城战事、1935 年华北危机,等等,国民政府因应的失利、退让和妥协,有其主观认知等因素,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内部分裂离心、不能一致对外的恶果。蒋介石有言,“不仅对于地方的行动中央不能干涉,甚至地方常以军事的实力威胁中央,以命令的方式来要挟中央”;“封建割据的实际,仍旧潜伏在形式的统一之下”;所以,他恨恨地说:“当今中国的病源,就是地方割据。”^①但是,随着中日关系的日渐紧张,中国的民族危机日渐深重,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中国的统一心理及趋向,经由外部压迫的途径,克服了内在的种种张力,不断复苏、发展、壮大。1937 年 7 月的卢沟桥事变,为近代中国在追求自身独立、反抗外来压迫的民族主义心理下的全国统一,创造了绝无仅有的契机,不分地域、阶层、党派、立场的全国一致抗日局面的出现,便是全国统一复现的象征。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准备对日抗战的决策时,也在考虑“征求各省长官意见”。^②而据时人的观察,蒋的抗战决策使“全国人心极为振奋”,“自蒋先生宣布决意应战后,全国人心均一致拥护,……在对日作战之前提下,已是举国一致”。^③原先对中央政权离心离德或者面和心不和的地方实力派领袖,一反过去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背离疏远或不即不离,纷纷对南京中央政权表示支持,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当年曾经站在反蒋第一线、当时仍有较强实力和地盘的晋系阎锡山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

7 月 9 日,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即致电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通报“此间于昨日得到卢沟桥冲突消息后,即电军委会通令全国戒严,并准备全部动员,以防事态之扩大”;同时征询阎锡山意见,“至对于此事如何应付,尚祈见示为盼”。11 日阎锡山回电蒋介石,称“对方利用形势,野心爆发,我方必须有抗战之决心,或可有和平之希望”。12 日,蒋介石电告阎锡山,“当在不求战而必抗战之决心下努力一切”。^④

山西东接河北,西邻陕西,位于东向出击华北前线、西向拱卫西北后方的关键位置,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平津沦陷后,山西成为日本在华北下一步侵略的直接目标。面对如此局面,一向习于闭关自保的阎锡山,为了保存在山西的统治基础,对抗战的态度较前积极,蒋介石的抗战主张,得到了阎锡山的呼应。对于自己的亲近下属之一徐永昌“再忍半年,较为有利”的提议,阎锡山则认为,“弱国如弱女,临难非有决心不能转变对方”。^⑤据徐永昌观察,“阎副委员长向极持重,今亦一变其常态,屡次来电,颇注意明轩(宋哲元)之决心如何”。实则反映出“中国人心,除殷汝耕外,凡稍有心

① 忻平:《灾难与转折:1937》,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3 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 年 7 月 19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③ 《王子壮日记》第 4 册,1937 年 7 月 13 日、8 月 2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年版,第 194、214 页。

④ 《蒋介石阎锡山往来电》,1937 年 7 月 9、11、12 日,《〈阎锡山档案〉选录——卢沟桥事变史料》,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 31 期,2001 年 12 月,第 91—92 页。

⑤ 《徐永昌阎锡山往来电》,1937 年 7 月 14 日,《〈阎锡山档案〉选录——卢沟桥事变史料》,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 31 期,2001 年 12 月,第 93 页。

肝者，决不易走入丧权失土之妥协”；正所谓“举国争言抗日，人心似极可恃”。^①也正是因为阎锡山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蒋介石认为他可以在决策抗战大计时有所借重。7月31日，蒋介石电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转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称，“国事危急，大计待决，请代邀伯公提前晋京，面商以期”。^②8月1日，阎锡山飞南京参会前写道：“病体未痊国难来，轻身为国理当该，扶病南行参国计，但求此去不空回。”3日，在国防会议召开前，蒋介石在一天中两见阎锡山，就抗战决策事宜有所征询。7日，阎锡山在参加国防会议的当天又提出：作战为手段，统制为目的，今欲打破敌人统制之目的，必须改变作战方式，变武力战为政略战。^③

在参加南京国防会议回到太原后，阎锡山在对外发布的文告中说：“自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开衅以来，占据我平津，残杀我人民，日日进兵，处处挑战，势非马上并吞华北灭亡我国不止。我们处在这大难临头千钧一发的时候，只有决心牺牲，才能保住我们的国家。要知现在的战争，不是单纯军队的战争，是全民总动员的战争。不仅是前线的战争，是连同后方一齐动作的战争。……所以有钱的要出钱，以集中物力；大家要出力，以集中人力。然后才能守土抗战，以挽救国家的危亡。”8月16日，阎锡山又发表《告山西全省人民书》，声明：“日本军阀用武力来侵略我们，想要亡我们的国，灭我们的种；我们为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民族，所以发动了这次的抗战。”^④此时此刻，中国军队正在山西外围的平绥线和平汉线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从北、东两线步步进逼山西，为了抵抗日军的入侵，阎锡山不仅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而且积极与进入山西的中共八路军合作，筹划抗战。山西即将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

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态度也为蒋介石所看重。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即电邀李宗仁和白崇禧同赴南京，共商抗战大计，得到了李、白的积极回应。7月19日，李宗仁电复蒋介石，“请速定抵抗大计”。^⑤21日，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五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路军副总司令白崇禧、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联名发表通电称：“顷读蒋委员长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发表关于卢沟桥事件之谈话，宣示政府对日方针，并明白昭示吾国应坚守四项原则，辞严义正，实为代表我全国民众公意，循环朗诵，感奋莫名。窃维卢案发生，我始终爱护和平，一再容忍，日方着着进逼，近更大举增兵，恣意挑衅。宗仁等欣聆国策已决，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暨广西全省一千三百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⑥24日，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致电李宗仁，对广西方面称未接到蒋介石有关电令之回复，表示：“值兹国策既已决定，国土主权必须确保，无论中途如何演变，终当努力以求贯彻也。承示委座电令对倭抗战方针，已屡电详告，而尊处则未接到一节，此中情形，当再详查奉告。惟以委座对公之诚笃，决无所隐，或者电中仅能及抗战之概略方针，而于抗战之详细计划，则繁复机密，多非面洽不可。前电拟请我公与健生兄抽暇赴京一行，意亦在此。未审究能命驾否：盼切盼切。”^⑦李、白随后复电南京称：“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势当拥护到底”；白崇禧“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李宗仁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

^① 《徐永昌致蒋介石电》，1937年7月21日，赵正楷、陈存恭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48页。

^②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2018页。

^③ 《阎锡山日记》，1937年8月7日，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157页。

^④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2027,2030页。

^⑤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7年7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23页。

^⑥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6年版，第282页。

^⑦ 《陈诚致李宗仁电》，1937年7月24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册，台北，“国史馆”2009年版，第117页。

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①

8月4日，白崇禧飞抵南京，当晚即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并讨论时局。蒋介石对桂系尤其是白崇禧的态度颇为满意，认为“白健生（白崇禧）到京，团结可喜，其形态皆已改正矣”。其后他调白崇禧任副参谋总长，参与抗战军机决策，并表示“对白应精诚相待”，“团结内部，信任健生”。^② 桂系对发动抗战的积极态度，对当时面临国民党内各种不同意见而又必须做出决策的蒋介石是有力的支持。过后，国民党内有人认为：“因此次战事而最得全国之佩服者，莫如广西之李白。……军队方面尽量开出，协助中央，……且其军队吃苦耐劳，勇敢善战，军事负责者无不赞其能，以此成绩方不愧多年之训练。以前与中央有抵牾者正以政策故，今知中央确实抗日矣，即不顾一切以助之。此真近代有政治思想者。”^③ 而作为民间舆情的反映，傅斯年认为：“两广对出兵助战之卖气力，可算一百分。广西军大批北上，全省总动员，广东军在上海战，死伤数万人，看来历年的‘人事问题’，算一扫而空了。”^④

晋系和桂系的对日态度实为当时多数地方军系对日态度的共同反映，阎锡山身处山西，地邻平津，与平津安危密切相关，无可逃避。即便是身处偏远西南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亦深知国家危亡实关地方利益，也表示对日抵抗的同仇敌忾之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往来电，反映出双方在抗战方面的一些共同想法。李宗仁致电阎锡山，认为“卢沟桥事件显系日人有步骤有计划之侵略行动，与昔年九一八事件实抱同一策略。查华北日驻屯军闻已有数万之众，年来恃不平等条约之便利，在平津一带到处侵驻，已同附骨之疽。连日其关东军又大举入寇，到处寻衅，势尤猖獗。我二十九军孤军应战，情势极为可危，似非发动举国一致之抗战，实不足戢日寇之野心”。阎锡山电复李宗仁，表示“日本无理寻衅，冀图大举入寇，诚如尊见非发动举国一致之抗战，不足以戢其野心。鄙意亦以为，在我必须有抗战之决心，或可有和平之希望。自当在全国一致之抗战决心下，努力一切也”。李宗仁再电阎锡山，强调“此时应集中国力与敌决一死战，以期死里求生，如再蹈以往覆辙，打头头应，打脚脚应，忍令山河破碎，则国将不国矣”。^⑤

不仅是晋系和桂系，其他与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前此不无龃龉的地方军系，乃至发动过直接反蒋行动的国民党内反对派，此时也多表示对蒋介石抗日决策的拥护和参加抗战的热忱。在地理位置上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地方军系错综复杂，统一内部尚且不易，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7月15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系首脑人物刘湘即电南京，“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德一心，共同御侮。自当漏夜整军方案赶速改编，以期适于抗敌之用。拾师之数，决当遵办。川省应负责任，不惟不敢迟误，且思竭尽心力，多所贡献也”。^⑥ 8月7日，刘湘飞抵南京，参加国防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第688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8月4、6日，10月5日，12月11日。后来蒋介石还提到，“信用健生，使之为国效忠”。《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3月25日。显然，蒋介石此时对白崇禧比对李宗仁更为信任，而白崇禧也比李宗仁对蒋介石更为拥戴，这其中反映的可能是李宗仁这样的军人政治家和白崇禧这样的职业军人之间的差异。据白崇禧回忆，1937年8月2日，蒋介石电召他入京共赴国难，李宗仁、李品仙、夏威、廖磊、黄旭初等广西领导人，“皆反对我入京，唯恐中央对我不利”。但白崇禧“力排众议，毅然入京”。这大概也是蒋介石对白崇禧更为看重的原因之一。至于有人说，冯玉祥、阎锡山、刘湘等到南京与白入京有关，白崇禧认为“未必然，因为抗日已是全国一致之要求”。此亦为持平之论。（贾廷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98—99页）

^③ 《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7年11月5日，第309页。

^④ 《傅斯年致胡适》，1937年10月11日，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26页。

^⑤ 《李宗仁阎锡山往来电》，1937年7月13、15、20日，《〈阎锡山档案〉选录——卢沟桥事变史料》，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31期，2001年12月，第98—99页。

^⑥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年7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86页。



会议,报告川康整军实施情形,并言“迩来国难严重,已到最后关头,全面抗战,誓不可免,筹划对策,权在中央,本人除敬聆蒋委员长及中枢各长官训示外,倘有所见,亦当尽量贡献,以供采择。国家民族已到最后关头,唯一生路只有抗战。举国民众慷慨激昂,已充分表现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精神。多难兴邦,殆已明验。敌虽强暴,我必争得最后之胜利也。四川为国家后防,今后川省所负之责任极巨,现时军队整理业已就绪,人力财力无一不可贡献于国家。个人此来,即欲陈明此意,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作准备,以纾中枢之忧,而慰国人之望”。^① 同日成都十万市民举行大会,决议请中央即刻发动全民抗战,保全领土,收复失地。^② 8月26日,刘湘发表《告川陕军民书》,提出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担荷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各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在国家统一指挥之下,整齐步调,严整阵容,在整个民族解放战线上作最前进之先锋,在实际战事上为前方之后盾。如此军民一心,上下共济,……掷身家性命于脑外,只知抗敌是目前唯一的中心,只知抗敌解放中国是唯一的坦道,排除一切歪曲的认识,克服一切事实的障碍,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中央领导之下,为民族抗战而效命”。^③

偏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7月28日发表谈话,申明“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务须无远无近,无老无幼,应以最大之决心,准备为国牺牲,以求延续我国家民族五千年之历史”。^④ 8月2日,龙云致电蒋介石,表示时局至此,“非集我全民力量,作长期抗战之计,无以救危亡”,并“誓为国牺牲之愿”。蒋复电称龙“忠贞谋国,至深赞佩”。^⑤ 9日,龙云抵京,这是他在云南当政10年后首次进京。他在南京与各方人物会见,同时对外公开发声,认为“现在国难异常严重,已属最后关头”;表示“竭诚拥护既定国策,接受命令”;“事已至此,现应少说废话,多负责任。身为地方行政负责人,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⑥

^① 《中央日报讯》,1937年8月8日,章伯峰、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②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月至12月),第240页。中国青年党首领、川人曾琦其时告刘湘:抗战前途,不外胜败两字,败固同归于尽,但此结果不大可能;假使抗战胜利,而川军未曾出兵,那真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对象,那时中央只须一纸明令讨伐,阁下纵有雄兵百万,其将奈何?(陈正茅编著:《曾琦先生年谱》,台北,“国史馆”1996年版,第138页)此语形象地说明了,在当时国内一致抗日的高扬气氛之下,地方军系首领能够作出的抉择边界何在。

^③ 丁成明、胡金玉主编:《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中),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488页。因为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性,又因为四川与国民党前此并无太深的渊源(晋系和桂系与国民党的渊源胜过川系),即便是川系表态支持抗战,蒋介石仍对川系抱有更多的顾虑和警惕。他在日记中写道:“注意:川刘与共党及各反动派勾结,其人私心自用,最无智识,死期当不远矣。”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0月14日。此并非蒋个人独有的看法,国民党中央不少人亦持相同看法。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王子壮在当日日记中写道:“自中央迁川,时闻刘湘不稳之传说,但观其出兵抗战,始则迟疑,既仅派六师(川共派十二师,余六师非刘湘系),川省军尚保有廿余万,且较精,绝非如广西之开诚相与,蜚语之来,盖亦有自。外传彼与韩复榘有默契,今韩以不努力抗战,被逮来汉,将予以军法审判,刘之不起殆亦因此,中央当此抗战之际,西顾之忧,得以消除,亦幸事也。”(《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1月20日,第384页)另据李宗仁回忆,抗战发动之初,蒋介石电邀各地实力派进京共商大计,刘湘曾有电致李宗仁和白崇禧,大意为:中央预备对日抗战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深思熟虑云云。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藉抗日之名,将李、白骗往中央,加以羁押,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李宗仁在回电中告诉他们,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如中央仍无心抗战,则全国军民不能同意,因此,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希望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89—690页)不过,考虑到南京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蒋介石借机吞并地方的可能性,地方对中央存有一定的戒心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妨碍刘湘和四川地方当局对支持抗战做出的贡献。

^④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8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26页。

^⑤ 《龙云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2日),《蒋介石复龙云电》(1937年8月4日),《滇军抗战密电集》,云南省档案馆1995年编印,第1—2页。

^⑥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月至12月),第247页。实际上,龙云与蒋介石之间,在一致抗日的大前提下,也存在一定的互相戒备的关系,蒋介石时时企图将云南纳入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紧密控制下,龙云则希望维持地方的某种自主性,双方之间的张力界限,恰恰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微妙性和复杂性。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名将，又在1933年发动福建事变、武装反蒋的前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和蒋光鼐，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自香港回到广州，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表示了参加抗战的心愿。陈铭枢说：“现在举国对日抗战，决心唯委座之命是从，不谈政治，恢复军人本色，拟俟任潮（李济深）到粤，即日赴京，纵为罪囚，或坐冷板凳，亦所心愿。”蒋光鼐说：“此次决心赴京，有如奔丧，到京有无孝服，在所不计。”^①

在卢沟桥事变刚发生时，国民党内还有人担心，“可虑者，地方与中央未能完全一致，地方对中央若尚存疑虑，则敌人各个击破之技售矣”。^②但是，过后的事实充分说明，面对日本的侵略，各地方当局哪怕是曾经武力反蒋的地方军系和实力派军人，与南京中央政府的抗战决策保持了基本一致的立场，并有支持抗战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昂扬抗日姿态。所以，蒋介石也认为，“国内军人团结精神较前增强，是抗战之效果也”。^③

当然，即便是在抗战的大环境之下，地方实力派还是有他们各自对地方利益的考量以及由此而致的地方性诉求，他们对于南京中央政府抗战决策的支持，随着时间形势的变化，也是有变化的，其坚定性和持久性，也未必那么一贯和无间。如徐永昌所观察，“惧日又不能不抗日，疑中央又不能不赖中央，今日中国之拥有重兵者无不然”。^④不过，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摆动幅度和边界，也只能局限在抗战的大框架之中，并由抗战所要达致的终极目标所决定。一旦越出这个框架和边界，地方实力派（其实也包括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的诉求将不再具有政治和道德正当性，其最有可能的结局，是被认定为卖国求荣的“汉奸”，这是和战前地方派系与中央政府矛盾冲突中那些反反复复而又能够最终和解的过程和结局有根本区别的方面。

二、社会各界对抗战的支持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不仅是地方当局一改过去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和冷漠态度、一致拥护中央政府实行抗战，媒体舆论、知识文化界包括国民党体制外曾经的反对派也多要求迅速发动抗战，支持南京中央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

知名民间媒体《大公报》的言论可作为当时社会舆论的代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大公报》连续发表评论，强烈呼吁全国一致，抵抗日本侵略，传达了媒体人的立场。《大公报》在社评中认为，“日本此次举动，实有武力攫夺华北的决心，我们除非甘心放弃中国北部各省，否则除守土自卫外，还有什么路径可走？时急矣，事迫矣，日方若果进逼不已，希望中央当局审度时势，领导全国，共走此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⑤《大公报》还强调，“表面和谈，固不可恃，局部妥协，尤无可能。此时负责当局须上承中央意旨，下徇全国舆情，立定脚跟，沉毅应付。苟安必不可求，寸土不容放弃。这是国民一致的要求，因为此外我们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之后，《大公报》发文表示支持，提出“我们政府方针是求和，不求战。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国土，不能坐视我们部队受攻击而不救。我们前天已说过，中国绝无再退再屈之余地，再退就是弃地亡国，所以今天的中国是被置在不得不奋斗不得不拼命之境遇中。这种情形，全军全民，人人了解，更盼望绝对共同认识

① 《陈诚致何应钦电》，1937年9月4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册，第120页。

② 《陈克文日记》上册，1937年7月13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0月23日。

④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8月1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00页。

⑤ 《我们只有一条路》，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11日，第2版。

⑥ 《国民一致的要求》，天津《大公报》，1937年7月16日，第2版。

中国是万不得已,是无所选择”。^① 不过,对于蒋介石的“不求战”说法,《大公报》的评论表示了一定的批评态度,认为“时局形势如此,所以我政府只标榜‘不求战而应战’,已不够应付,因为那是态度,不是方针,方针是多含主动成分的,是应当有积极意义的。”^②

7月底,当日本不断扩大侵略,平津面临危急存亡之时,地处天津的《大公报》总部在天津沦陷被迫停刊前最后出刊的几期报纸的社评中,坚定地呼吁政府和国民:“这多少天来,全国的空气是一致拥护蒋先生的演辞,大家对于演辞全文的精神,想必一致了解。现在既到最后一秒钟,国家怎样行动,需要政府明白决定”;“政府责任现在万分重大,其负责的对象,不但是现在的国民,并且是未来的历史!”^③《大公报》上海版在7月28日发表的社评说得更为干脆明白易读易懂:“最后关头到了。我们全国人心,倒是从此安定。只有亿兆一心,保卫国土,应援前线,其他一切,不必谈了。”^④次日的社评又论述道:“老实说,除非日本相逼,中国是永不会与日本战争的;而且寻常的逼迫,还打不起来。这个理由,极容易了解,因为交战是整个在我们领土内,一切的战祸,都是我们受。所以即使我们国防充实,当然要尽力避免破坏。”但是,“这二十天的卢沟桥事件,证明对方逼着要打,怎样回避,也避不开”;“所以今番的特色,不是条件问题,而是任何条件换不来免于挨打的问题”。“我们军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之后,昨天只有悲愤应战。因为中国今天整个是背水阵,要想独立自由,就必须拼命,不然,就必须降服,并且降了还不给留余地。日本是侵略邻国,毫无不得已的理由,中国是生存问题,只有彻底牺牲,才能自救”。^⑤ 言为心声,这些毅然决然、坚定执着的言词,传达着媒体人也是媒体所代表的中国人一致的心声!

国民党曾经的反对派也对国民党的抗战决策表示了支持。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曾琦在四川成都发表的广播演讲中认为,不论从财政、粮食、封锁、武器、战斗经验、指挥人才、动员各方面去分析,日本必败;另就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国际情势、精神方面去看,日本亦无成功之理由。因此他估计“抗战一年,有六成胜利把握;二年有八成把握;三年有十成把握。我们且把握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争取必能获得的最后胜利!”^⑥中国青年党另一领导人左舜生致函蒋介石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亦致函蒋介石表示,“对于国民政府至诚拥护”。^⑦ 7月16日,张君劢在庐山谈话会发言,表示“现在中国的问题,除了生死存亡问题之外,再没有其他意见。我们除了维持民族生存保障民国独立以外,没有第二个希望”。“在现在国难的时候,党与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决无争执之必要,亦无争执之可言。否则中华民族不能生存,还有什么党争可言”。^⑧

知识文化人对形势的变化更为敏感,表达自己抗日诉求的愿望也更为强烈。身处抵抗日本侵略最前线的北平,北京大学教授在7月24日发表《对卢沟桥事变之宣言》,声明:“我民族纵爱好和平,但不能放弃卫国的职责,更不能坐视人道和正义的被摧残而不奋起维护。现在和平的希望,已到了绝续的关头了。我们的政府,仍本着‘求自存与共存’的政策,始终一意爱护和平。……倘使日本还不悔悟,那么我们举国上下惟有牺牲一切,抗战到底,不幸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为抵御暴

① 《时局到最紧关头》,天津《大公报》,1937年7月19日,第2版。

② 《国家的重大时机》,天津《大公报》,1937年7月24日,第2版。

③ 《和平绝望的前一秒钟》,天津《大公报》,1937年7月27日,第2版。

④ 《和平绝望》,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28日,第2版。

⑤ 《艰苦牺牲的起点》,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29日,第2版。

⑥ 陈正茅编著:《曾琦先生年谱》,第139页。

⑦ 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页。

⑧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上),第299—300页。

力而战,为保其国土而战,为人道和正义而战,为人类的自由而战,为世界的和平而战。”^①南京各学校学生则通电全国,声明“我们忍辱负重已经六年了,现在不能再失去寸土寸地,我们要做政府坚强后盾”。^②著名作家茅盾写道:“现在半个中国已经响彻了炮声。这就是中国民族求独立自由的伟大怒吼!我们愿意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我们所得的代价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自由。”另一位著名作家巴金则在为淞沪抗战发动而特别创办的新刊《呐喊》上写道:“一个人的生命是容易毁灭的,群体的生命就会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换句话说,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是全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日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多数知识文化人对抗战的热烈支持相对比,知识界部分人士尤其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较深的知识界部分人士,对于抗战却有比较持重的态度。时任教育部部长、与知识界人士多有往还的王世杰,在其日记中对此有一段细致、生动而形象的记载:“首都一般人士,均深感大战爆发后之危险。无知识或无责任之人,感觉身家危险,有知识者则对国家前途不胜恐慌。故政府备战虽力,而一般人之自信力仍日减。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惧,并主张汪(精卫)、蒋(介石)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州国为议和之条件。吴达铨(鼎昌)今晨向予言,战必败,不战必大乱,处此局势,惟有听蒋先生决定而盲从之。今日午后约胡适之、吴达铨、周枚荪(炳琳)、彭浩徐(学沛)、罗志希(家伦)、蒋梦麟诸人在家密谈。胡、周、蒋均倾向于忍痛求和,意以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达铨则仍谓战固必败,和必乱。余谓和之大难,在毫无保证;以日人得步进步为显然事实;今兹求和不只自毁立场,徒给敌人以一、二月或数月时间,在华北布置更强固,以便其进一步之压迫。”胡适尤为这些人士的代表,后来他还将其意见面告蒋介石。^④所以,才有8月7日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对胡适的“讥讽”和程潜“指摘胡氏为汉奸”之言词。其实,就这些人之前和之后的表现而言,他们也痛恨日本的侵略,同时坚定地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在抗日立场的大节方面无亏,但在当时,他们可能比较多地考虑到中日国力对比的差距,顾虑一些现实的困难,自认为不能如同文化人那般“浪漫”,而是应该讲求知识人的“理性”,所以主张对日持重,不主张即时对日开战,也是出自可以理解的缘由,或未可太过苛求,而且他们的看法多少也有助于克服抗战初期某些过分的“乐观论”。^⑤当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们也都积极投身于抗战,并在各自不同的位置,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对于那些过去反对和批判国民党,因而被压制甚至被捕被通缉的左翼人士,在全国抗战发动之后,国民党和蒋介石也开始改变态度,采取了适当的缓和措施。蒋介石认为,“紧急时更须宽缓,此治国平乱对敌惟一之道也”,并考虑对“文艺界之接见与联络”。^⑥

著名的反蒋左翼文化人郭沫若,1927年5月被国民党通缉,后流亡日本长达10年。抗战爆发

①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月至12月),第191页。

②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8卷,第5490页。

③ 忻平:《灾难与转折:1937》,第312—313页。

④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7年8月3、5日,第28页。日记中提到的人物,胡适为北京大学教授,吴鼎昌曾任《大公报》社长,时任实业部部长;周炳琳为教育部常务次长,彭学沛为交通部常务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

⑤ 中日开战之初,蒋介石认为,日本在经济上,财政非常困难,现在已大不如我们。参见《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章伯峰、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2卷(上册),第81页。阎锡山认为,“日军除运用火力外,他无所恃。其军官士兵,一生活优裕,二感觉战争无意义,故在战斗上,只要避开其火力,使其火力不能充分发挥,必可取得胜利”。参见《卢沟桥事件第27次会报》,1937年8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2),第53页。这些看法倾向于“速胜论”,对于中日实力对比的估计显然都过于乐观,未及预见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7月18日、12月19日。

后,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自日本回到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知照行政院、司法院和军委会,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随后,郭沫若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社长,投身于抗日洪流。淞沪抗战打响后,郭沫若在日机轰炸下写成《我们为什么要抗战》,疾呼抗战就是“为保卫自己的祖国,为保卫世界文化,为保卫全人类的命运”。^① 1938年,郭沫若在武汉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活跃于武汉时期的政治和文化舞台,成为国民党在战时容纳过去的反对派人士进入体制内服务抗战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全国抗战开始后,为集合各方人才一致抗日,国民政府决定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删去其中原先规定的“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为“危害民国”之犯罪的条款,着重惩处那些“私通敌国”“勾结叛徒”“泄露秘密”“动摇军心”的犯罪,并在9月4日公布。^② 因为该法的修订,过去“持不同政见从事政治活动者”,不少人得以恢复自由。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1934年6月以“危害民国”被处8年徒刑。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发令,以其“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决定“依法宣告减刑”。^③ 23日,陈独秀被释放出狱。被关押在南京等各处监狱的中共党员数百人也在抗战开始后被陆续释放。

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因为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内战政策,以“危害民国”罪被逮捕并起诉,并在1937年6月开庭审理,史称“七君子”案。此案引起相当大的社会反响,招致舆论和国民党党外人士的批评,使国民党政府颇为被动,其党内也有主张以温和方式解决此案者。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7月1日,陈诚即致函蒋介石,转其友人函,请求将沈钧儒等“可否请由钧座准予先行交保,调至庐山受训之处”。^④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准备对付日本入侵、发动全国抗战的形势下,为联络各界力量,对外展示国民党的政治新姿态,蒋介石考虑从速解决此事,以“保释”的方式,早日“了结”此案。尚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等候判决的“七君子”,亦表示支持蒋介石抗日、实现政治和解的态度。他们联名致电蒋介石,称赞其庐山谈话“义正辞严,不胜感奋。深信在此伟大号召之下,必能使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同在钧座领导之下,以趋赴空前之国难”。表示自己“身羁囹圄,心怀国族,寇氛日亟,倍切忧惶,赴难无方,赤诚共抱,企望旌麾,无任神驰”。此后,7月30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各被告危害民国一案,羁押时逾半载,精神痛苦,家属失其瞻养”为由,决定予以交保释放。^⑤ 31日,沈钧儒等“七君子”获保释。^⑥ “七君子”获释后,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采取了和解的态度,沈钧儒对外公开表示,“我们之出狱,完全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们对他很感激。我们一接到蒋先生电报,即赴京谒见”。“此后仍本救国初衷,在委座领导下,不惜牺牲一切,从事救国工作”。^⑦ 1938年1月1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现在反省院受反省处分者,准予取

①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全民抗战气壮山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②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37年9月4日修订公布,《国民政府公报》第2450号,1937年9月6日。

③ 《国民政府令》,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公报》第2439号,1937年8月23日。

④ 《陈诚呈蒋介石》,1937年7月1日,何智霖主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281—282页。

⑤ 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史(1936—1949)》,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⑥ 1939年1月26日,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据修改后的法律,认为“被告等虽属组织团体,号召民众,但其所谓抗敌御侮及联合各界救国各节,均与现在国策不相违背,不能认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该被告等之行为自属不罚之列。”决定对“七君子”撤诉起诉。参见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史(1936—1949)》,第169页。

⑦ 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史(1936—1949)》,第168、173页。

保释放,反省院裁撤”。同年 11 月 19 日,明令废止《反省院条例》^①,希图以此显示抗战时期对于过往“政治犯”的“不咎既往”,体现团结一致抗战的精神。

三、抗日民众运动的高涨

卢沟桥事变及全国抗战爆发后,原先对于民众运动比较警惕的国民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运动放松了管制,以得到民众和舆论对抗战的支持,并借以营造民众支持政府抗战、政府领导民众抗战的热烈气氛。往年有些寂寞冷清的“九一八”纪念日,“为避免敌人借口,不举行任何仪式,几乎提及‘九一八’一词,亦在不许之列。今年始扩大宣传,到处开会宣誓,誓驱倭寇,收复失地”。^②尤其是在战争重心从华北移至淞沪地区后,以上海为中心的民众抗战动员活动一时颇为轰轰烈烈,无论政治立场的左中右,社会各界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中。

7 月 8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次日,消息刚刚传来,政府决策未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部长吴开先即访晤知名大佬杜月笙,希望他出面重组“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支援前线将士。其后,由杜月笙、虞洽卿、钱新之等社会知名人士发起的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在 12 日成立。^③ 22 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组织商会、地方协会、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委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律师公会等 15 家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由王晓籁、杜月笙、钱新之、潘公展、黄炎培等组成主席团,发表宣言,号召“凡属国人,皆当奋起,统一组织,集中力量,以铁血求生存,作抗敌之后援,一心一德,念兹在兹,各竭其能,各尽其力,非达到国土完整、民族复兴之目的,誓不稍懈”。^④ 抗敌后援会主要由国民党操控,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但在发动民间力量支援前线作战、救治资助难民以及宣传鼓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8 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代表官方的右翼文人潘公展、代表民间的左翼文人胡愈之共同担任常务理事,并出版《救亡日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分别具有国共两党身份的樊仲云和夏衍出任总编辑。

上海的工商界,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薪阶层,都参加到支援抗战的工作之中。8 月 12 日晚,就在淞沪战事即将爆发的前夕,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发表广播演讲,声言:“诸位同胞,现在真到了最后关头了。每个人只该埋头工作,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我觉得为了国家,流血、流汗、捐钱、捐物,都是最光荣、最有价值的行动。我们大家不愿做奴隶,不愿做汉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还有什么话说!”大战爆发后,在各方抗日热情的激励下,9 月 2 日,上海市商会发表通电,号召大家踊跃捐输,提出:“此次对日抗战关系全国存亡,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伍万万元,实为厚集财力,持久制胜之准备,意义重大”;为此成立上海市商界劝募总队,各商店以其资本额承购 5%、公积款项承购 10% 为标准,店员月薪满 50 元者承购 10%,不及 50 元者自由认购。上海市商会及银钱业同时宣布对日实行经济绝交。^⑤ 上海多家日商工厂的工人举行反日罢工,不少日本洋行的华人雇员辞职离岗。“日人大起恐慌,多允增加工资,而各职员及雇工,毅然不受金钱诱惑,断然告退”。^⑥ 10 月 1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函》,1938 年 1 月 1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局政治制度档案史料汇编》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84 页;孔庆泰等:《国民党政局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7 页。

^② 《陈克文日记》上册,1937 年 9 月 18 日,第 106 页。

^③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 8 卷,第 5478—5479 页。

^④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 1985 年编印,第 285 页。

^⑤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13—316 页。

^⑥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1957 年版,第 209 页。

日,上海市商会举行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发表《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宣言》,提议“国人为自卫计,为协助政府长期应战,消耗敌人实力计,实有速行国民对日经济绝交之必要”。宣言发表后,得到上海全市一百数十家同业公会的一致响应。^①

与上海的抗日动员相一致,全国各地的抗日动员活动也都在热烈展开。7月14日,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各省区商会联合会,迅速联合当地各界,组织抗敌将士后援会,劝告各界自由捐输,并转知各商店工厂,先捐一日营业额十分之二,汇往慰劳前线将士。^②8月1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宋美龄发表演说:“凡是自爱的民族所能忍耐的,我们都已经忍受了,我们不要再迟疑,要勇往向前,用尽我们全副力量,来救国家的危急。……我们要保全国家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我们妇女也是国民一分子,虽然我们的地位能力和各人所能贡献的事项各有不同,但是每人要尽量的贡献她的能力来救国。……打仗的时候,男子都要上前线去杀敌,后方工作是我们妇女的责任,我们须要鼓励着男子,使他们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来拥护他们,使他们无后顾之忧,不是来阻碍他们;我们也能够牺牲一切,就是我们的生命也能牺牲,来拥护我们前线的忠勇将士。……我希望我们大家能联合一起,成功一个大团体,使我们的力量更加雄厚,真的团结便是力量,前线将士的勇气,全靠后方的拥护。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应该时常牢牢记着,国家最后的胜利,无论延迟到哪一天,终久会达到目的,我们一定能扫清重重叠叠堆在我们心头的日历的国耻!”^③早前,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界人士,在上海成立妇女抗敌后援会,由何香凝任主席,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后,上海妇女抗敌后援会于8月4日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如宋庆龄所言,在当时的上海,大家“并肩在火线上一起工作。千千万万妇女都出钱出力或者既出钱又出力”;“人民成立了志愿队,将伤兵从前线抬回来,替伤兵们缠绷带,缝织伤员的衣服,看护他们,替他们写信和组织娱乐活动”。^④

为了配合中国军队在战场的英勇抵抗,各种宣传方式尤其是那些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迅速流行开来。何香凝、胡愈之、史良等发起成立了上海战时壁报工作服务团,“每天把抗战的消息、战时应有的知识、后方民众应尽的义务,经过壁报来贡献于市民,并经过壁报来辅助其他工作团体进行工作”。^⑤壁报曾经对“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壮举这样写道:“闸北没有天,看四行仓库上飘扬着我们的国旗,他们八百勇士不愿撤退,誓与倭寇拼性命,誓与闸北共存亡,忠勇的八百勇士呀,你们是中国的抗战中勇士,你们光荣的牺牲精神,将掀起抗战复仇的决心!”^⑥

文化界是抗日宣传的主力。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上海左翼文化人便集体执笔创作了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由100余位电影话剧演员参加演出,在卢沟桥事变发生1个月之后的8月7日搬上了舞台。剧中主题曲唱到:“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中华民族是一个铁的集体!我们不能失去一寸土地!兵士战死,有百姓来抵!丈夫战死,有妻子来抵!中华民族是一个铁的集体!我们不能失去一寸土地!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

此时此刻,全场观众无不热血沸腾,齐声欢呼!卢沟桥,这座横亘于北平郊外永定河上默默无

①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8卷,第5619页。

②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8卷,第5486页。

③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上),第286—287页。

④ 宋庆龄:《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9—160页。

⑤ 《上海战时壁报工作服务团缘起》,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09页。

⑥ 《八百勇士守闸北歌》,《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辑,第325页。

言、饱经沧桑的八百年古桥，已然成为 1937 年 7 月中国的象征，“保卫卢沟桥”，也是在那些不眠夏夜中，无数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心声！

过去因为政府的对日政策而在宣传中被外界所诟病并屡屡处于被动地位的国民党文宣系统，在战争发生后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对外发布的“抗日问答十项”中有下面这样的问答式表述：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抗日呢？

日本要灭亡我们的国家，我们已忍无可忍，让无可让，非抗他不能生活了，所以我们非起来抗日不可。

不抗日可不可以呢？

不可，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了。不仅自己当亡国奴，子子孙孙都要当亡国奴的。

什么叫亡国奴呢？

亡国奴就同高丽人台湾人那样，任人欺侮，任人劫夺，任人宰杀。祖宗的坟墓不能保，田园庄宅不能保，金银财宝不能保，生活真是连猪狗都不如。

怎样才能不当亡国奴呢？

只有信仰我们的中央政府，帮助我们的国家军队，拥护我们的军事领袖，大家一致起来抗日，才能不当亡国奴。^①

上述问答的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主旨在于可能成为“亡国奴”的悲惨前景和悲情意识，唤起国人同仇敌忾的抗日之心，具有相当的宣传动员力。虽然其中“信仰我们的中央政府”“拥护我们的军事领袖”，凸显了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抗日立场。但是，这样的抗日宣传出自于国民党文宣系统之手，不仅表示出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的民众动员努力，而且与左翼文化人的抗战宣传相呼应，充分表示了政治立场左中右光谱中的各派力量在抗日立场上的一致性。不当“亡国奴”，也是贯穿整个抗战期间最能打动国人心弦的抗日宣传主旨之一。

四、一致抗日与民族复兴

自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到 8 月 13 日淞沪抗战爆发，全国抗战成为事实，不过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中华民族积数千年历史而形成的无比坚韧性和中国民众为抵抗日本侵略而保家卫国的正当的、理性的、热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得到空前的发抒和释放，并在广阔的时空层面，超越了地域、阶层、党派、政治立场的差异，表现为“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② 这样的“觉醒”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共同认可。傅斯年称赞：“国内抗战之意识有增无减，老百姓苦极而无怨言，上海前敌兵士，真是再好也不能了。”“我们是以血肉抵抗飞机、大炮，不消说死伤之多，数目听到吓死人。但千古未有之勇敢，完全表见。这是抗日训练大成功”。^③ 王子壮注意到：“我方自蒋先生宣布决意应战后，全国人心均一致拥护，如向日稍有违异，亦均一致主张，如广西白崇禧、李宗

^① 《市党部颁发抗日问答十项》，《申报》，1937 年 10 月 13 日，第 6 版。据冯玉祥言，此项抗日宣传问答是他早先以此意面陈蒋介石，“荷蒙采纳，属将此项宣传文字写出”。由此可知，国民党高层当时也曾介入抗日宣传的部署。参见陶英惠辑注《蒋冯书简新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 2010 年版，第 288—290 页。

^② 宋庆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宋庆龄选集》，第 120 页。

^③ 《傅斯年致胡适》，1937 年 10 月 11 日，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 2 卷，第 626 页。

仁之请缨,上海沈钧儒等七人之释放,郭沫若之取消通缉返国,均表示绝对拥护中央抗战之主张,是在对日作战之前提下,已使举国一致,今后苟能于战事方面支持长久,不致为敌人所屈服,我国转弱为强、复兴国家之机会,亦在于此矣。”^①即便是一向因民众动员可能溢出控制而小心谨慎的国民党领导层,在全国抗战初起时也体认到民心之力量和民气之可用。蒋介石决策发动抗战的动因之一,便是他体认到,“平津既陷,以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对倭抗战,以倭内部之虚弱及其对华之横暴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也”。^②所以,蒋介石在对军队进行抗战动员时也难得地谈到民众动员之力量:“任何战争得到民众帮助的,一定胜利。这次抗战,尤其应该发动全国各地方全体民众的力量,来和敌人拼命。但是要希望民众和军队合力一心,合拍应手,一定先要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得到他们的信仰,才能达到希望。”^③而在日本之外的世界各国,也都注意到中国因对日抗战而迸发的高昂民气。美国《时代》周刊写道:“所有一切意味着日本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在上周已使全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明显比以往团结得多。”^④法国左翼《人道报》的评论更为鲜明:“许多年以来,我们英勇的中国同志所不倦地呼吁的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地矗立了起来。”^⑤完全可以这么说,1937年7月7日深夜,中国军队为抵抗日军侵略而在卢沟桥发出的划破夜空寂静的自卫枪声,是中华民族在艰难重压下追求民族独立复兴的重生号角!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复兴之路迈向转折的标志!

[作者汪朝光,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7年8月2日,第214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8月31日。当然,后来蒋介石和国民党未能在抗战中充分动员民众,反而因其政策和施政的不当,而逐渐失去民心。蒋经国承认,这是因为“工作中心没有将广大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作为重点”。(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上册,1945年3月1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438页)所以蒋介石曾“浩然长叹”,“如果长此下去,不但死无葬身之地,且亦将‘生无葬身之地’”。(《王子壮日记》第8册,1943年11月24日,第454—455页)又如毛泽东所言:“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之士其思之。”(《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1944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③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月至12月),第243页。

^④ 李辉:《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⑤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第560页。